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的设立，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第三，在方法层面，必须警惕“技术万能”倾向。碳十四、分子古生物学只能回答“何时、何地、何物”，而“为何、如何”仍须回到历史学的语境分析与价值判断。

应对这些挑战，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坚守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人群与环境的适应机制为提问起点；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视野，积极吸收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的理论工具，在“中国案例”与“世界比较”之间建立可互通的分析框架。这样，新时代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才能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工程中，既不失本土之“根”，亦具世界之“眼”，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提供更为丰富、细腻、持久的学术贡献。

近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概观

楼 劲

近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方面承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系列新生面，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新趋势。这两个方面并行发展、相互影响，后一方面是在前一方面发展基础上，因时代、学科等诸多要素风云际会而出现的。

承续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态势的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的集成式整理研究和专题化开拓解读；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和国际学术交流的空前活跃；职官、礼法、户籍、财政等各项制度研究的显著发展；佛、道等宗教及经学、玄学、子学、史学、文学、术数等思想文化研究的较大推进；衣食住行、环境生态、医疗疾病等社会生活史和边缘人物、弱势群体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五大突出进展，也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断代史研究具有较大共性的部分，体现的是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历史运动，更为具体切实地认识历史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态势。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这些年来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古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成果：从职官、礼制、法制及户籍、财政等制度研

究的代表性著作，到佛教中国化与道教转型以及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些精彩的讨论；从家庭家族、个体生命、社会性别和社会生活史领域具有引领作用的力作，到史料批判、历史书写和公共史学等方面探索的代表性作品，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仁贡献尤著。学界同仁也多认为目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活跃度较高，青年学者成长较快，原创性成果频出，研究手段更为丰富且多巧思，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更为深入多样。这些成果既显著提升了其所涉领域和方向的学术水平，由此涌现的一系列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方法，也有力拓展了魏晋南北朝史其他各领域、方向的研究前沿，从而为新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的探索发展提供了助力和条件。

我们也曾对其原因加以探讨，如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学者奠定的研究框架较为开阔恢宏，起点较高，积累也更为深厚。又如魏晋南北朝史本身就甚为丰富多彩，其上承之汉和下启之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均有特殊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不能不参照更多维度，并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思考整部中国史的状态。再如魏晋南北朝虽是中国古代史料的爆发式增长期，但至唐宋这些史料又大幅度逸佚而残存零星，这样的研究前提也使研究者不能不更为讲究史料考订、解读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激发和老中青学者为之付出的卓杰努力。我们亲身经历了思想从僵化到解放，社会从沉滞到活跃的伟大转折，因而深知改革开放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既与这一系列变革息息相关，又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发展起伏的继续展现。因此，在欣喜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纠偏补弊、空前繁荣，所获成就极大提升了本领域研究水平，并且牵动了中古史研究创新的同时，也须看到其总体上仍带有中国现代史学早先形成的局限，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归纳这些局限和相应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部分，多为以往研究较为薄弱且在现代化实践中愈显重要的领域和方向，如制度、宗教、思想文化和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具有较为明显的“补短”“应急”属性。与之相伴的则是以往一些重要研究板块的冷清，从而表明这些显著增长的研究与以往特别强调的一些研究存在着类似局限，着眼的主要还是一时需要聚焦的局部，而非历史运行的结构机理及其关键细部，较少观照当代社会和改革发展之全局及其所归。二是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反传统”精神，其代表人物早先曾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以“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家谱”；继起的各种中国历史教科

书和国史著述，也几乎都是先把传统史学变成一片废墟，将传统史籍看作可以随意提取的原料仓库，再据现代学术范畴尤其是各种社会发展观来另起炉灶，重新构筑历史要素及其关系。这在着力学习先进、排除障碍的现代化起步阶段确似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至于晚近则其弊渐显。尽管已有所改，却终究还是不免多解剖而少还原，重理智而轻感情，见其物而不见人。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认识成了“两张皮”，结果经常是把“中国问题”搞得支离破碎。三是解释体系仍多倚重外来学说，在不少问题上随外人起舞，尤其所用中程理论，从中世说、贵族制社会说到东亚世界说、征服（融合）王朝等说，皆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大多属于外来学说。这种解释体系源头在外，不甚贴合中国历史及其研究的实际，更大大滞后于当代中国迅速发展的状态，制约了研究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拓展领域和方向的，更是在党和国家新形势、新任务推动下，呼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总结，省思以往历史认识的过渡性和局限性，逐步开出新生面的。就其业已显露的趋势和蕴藏的内涵看，无妨视之为当代中国史学转型的缩影，其要则可概括为三个关怀。

一是对传统的关怀。这些年来，我们在全各地开会讨论那里的魏晋南北朝人物、事件，旨在探讨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其区位特点、特色要素及其影响。这是新时代以来非常显著的变化：对待传统的态度变了，感情也变了，从疏离到亲和，从浅表到深层，从外行到内行。不唯各地各部门干部如此，关注择业就业的学子、家长也如此，包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在内的专家学者还是如此。请注意，这不光是中央重视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历史、收藏文物、关注考古、参观遗址、购买典籍，在历史和考古博物馆门前排队。这些珍视历史传统的现象，都是随各地经济起飞，随小康社会建设和到来而出现的，可以视为后发国家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共同趋势，但也确以传统至为悠久深厚的中国为最。

古代中国一向极重传统，故有“正统”“道统”“法统”以至“世系”“谱录”“统纪”等诸多名物，列入史部的典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大半皆为保存和弘扬传统之故。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正是因其传统的绵亘，并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同历艰难险阻和欢快喜乐。但到近现代，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悠久深厚的传统开始被视为沉重的负担，俨然是各领域现代化进程顺利展开的障碍，反传统思潮盛极一时，持论极端者甚至以为中国

古代传统除去厚黑权斗全无现代价值。真正的转变发生于改革开放之中，而重新关怀自身和家国承载的传统，消融现实与传统的隔膜，视之为现代化进程至可宝贵的资源，所有这些转变的节点正是在新时代。除学界同仁有鉴于此——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和各种专门史研究愈益重视对各领域大、小传统脉络的清理，笔者认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态势，乃是素来信仰传统却又几近中辍的中国人，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白传统既在专家学者案头，也在亿万大众实实在在的工作、生活之中。这个明白里面，内涵很多，很值得吟味。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是对待文明与未来的态度。从悠久深厚的传统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汲取能量、聚变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寻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以此赓续和更新自身的传统，这也正是新时代对传统关怀日增的独特底蕴。

二是本土关怀，这是近年来中国史学呈现的又一标志性现象。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相比以往用外来学说、方法诠释历史现象，由此推出选题、形成热点，以证明、补充或修正相关学说、方法的习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看重根据历史时期实际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并在各自关注的个案中思考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这类研究更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也有更为活跃、更受重视的国际学术交流，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已从两头在外变为两头在内。从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体制和易代模式及其思想文化背景，到提出中国古代官僚体制蕴含的技术理性，进而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内生规则；从针对术数讖纬、宗教信仰的政治学、社会学讨论，到村民生活、宫女命运和知识阶层生存状态的研究，以及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的个案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近年中国史学的这种本土化转向。与之相呼应的，还包括概念范畴尽可能尊重古人原有表述，研究过程则更讲究田野调查和贴近历史现场等一系列取向，皆可视为本土关怀的例证。

从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态势看这些变化的内涵，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探索空前深入，所有阶段性目标都已聚焦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千头万绪的发展也均归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时，如何扎根本土、关怀本土并审视本土发展与当代世界的联系，自会成为一代学术的至上主题，足以影响中国学术的长远走向和轮廓。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现实，更衬出了前面所说中国历史解释体系长期以来的滞后局限，凸显了外来理论工具与本土实际凿枘不合、多有扞格的问题。而原始要终，无论是从世界发展大势来定位中华民族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是要把当代中国的创造、实践筑基

于悠久恢宏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只能是在本土。新时代提出的“两个结合”，也就是从本土关怀中产生的命题，其着力点又尤其在于本土化可能催发的无限创造。再者，本土关怀又是相关理论、学说、知识自主的必由之路，因为所谓自主，首要的是本土研究的自主，其核心就是扎根本土实际，直面本土问题，提出本土解释。为此，必须更为科学地调度、运用各种知识与方法，更加实事求是地博采众家之长，由此达成知识的增长和理论、学说的创新，达成本土现象诠释体系的自主。是为近年中国史学本土关怀之要，也是中国史学由器入道的关键一步。

三是人文关怀。这也是新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大趋向，表现之一是文学、哲学、美术史研究者和佛教、道教、民族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更多关注，也包括其所出成果的影响日增。这些成果的人文内涵，往往要比史学界的成果更为丰富，更为饱满。表现之二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界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情感浓度也在增加。精神世界的研究尤其如此，从心态、情感、人格、意志等方面为这段历史增加了生命的气息；对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给予了更多关注，石刻与造像资料为之提供了更具温度和色彩的资料支撑；对个体生命史和历史记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像从政治史到服饰史的内涵探求一样，引入了更多的价值元素和良知诉求。这些方面的交相影响，构成了近年魏晋南北朝史著述尤其引人入胜的要因。

诸如此类相比以往更加重视人文的现象，既体现了现代中国学术在长期分化、细化后尤须交叉综合的趋势，也说明了史学界同仁对以往百余年研究局限的省思。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各种社会科学按自身特点阐释的历史要素及其关系，说到底是在人的主导下展开的。而对人文的关注，自然更多地需要人文学科的视野，不只要考虑思想、情感、信仰、意识等人文学科擅长的要素，更要落实到人的能动作用，才能真正说明人的历史。这类省思学科发展和加倍关怀人文的倾向，当然是与一段时期以来强调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相联系的，其学术表现尽管未必一一与之合拍，却仍总体地嵌入了“人本身的发展”这个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主题。需要指出的是，人文关怀的实质仍是至为深沉的现实关怀，其之所以发育成长，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正在更多地涵养人文，但还远远不够；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正于转型中新陈代谢，又尤其需要有更多的人文追求。此即新时代史学界所示人文关怀的特质，而其态势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展。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新时代意味的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更大选择余地

和发展空间，整个社会充盈更多的生机和可能，每个平凡的个人及其家庭则有更为丰富、切实的途径来达成愿景。以上所述三个关怀，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对此潮流的响应，而其观照于怀的追求，也正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历史认识与历史创造的统一。当然在回顾、总结之余，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如话题的雷同和研究的同质化之弊，过求宏大叙事而易飘浮不实，等而下之者更有鱼目混珠之玷。这是大潮流中不可避免的泥沙。此外又有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如这些关怀与近现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中华文化本位论的新旧异同之类，这也是大趋势下众制锋起、源流间出的必然。学界同仁理当鉴其精粗、实事求是，崇尚澄澈精诚的研究，期许更为远大的前景。

隋唐史与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回归

孟宪实

隋唐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断代，对其历史的研究从未间断，而且从未脱离中国史学的整体框架。后者的逻辑、特征和基本方法也是隋唐史研究的主轴。近代以来，中国史学遭逢的所有新问题，在隋唐史研究中均有具体反映。立足新时代，中国史学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隋唐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总体而言，中国史学在经历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两大阶段后，正步入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

一、从隋唐史学看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

断代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这与正史的朝代书写存在紧密联系。朝代更替本就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之一，故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中，以朝代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未曾间断：一方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记载和基本史料；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传统史学的基本观念、逻辑和方法。近代虽然提出针对王朝史学的史学革命，希望打倒王朝史学，但是王朝既然是历史呈现的一种基本形态，朝代史的记述和研究就